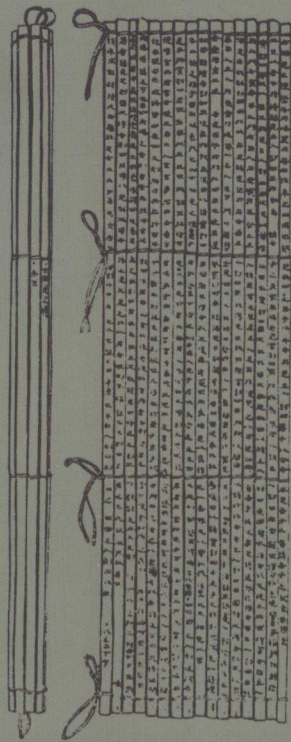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丛书



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

冯良方◎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丛书



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

冯良方◎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冯良方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11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丛书)

ISBN 978-7-80752-283-6

I. 云… II. 冯… III. 古文文学—文献—研究—云南省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422 号

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

冯良方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周 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83-6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段炳昌 王卫东

编委：罗江文 冯良方 李道和 杨立权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前言

古典文献是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浩瀚的古典文献得以传承和弘扬。培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才，总结古典文献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教训，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古典文献，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应当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地承担重任，既要通过严格系统的训练，培养一批批具有古典文献整理研究专门知识的人才，又要利用优势，潜心钻研，推出一部部高质量的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著作。

云南大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良好的基础，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代有闻人。袁嘉谷、刘文典、姜亮夫、方国瑜、李埏、张文勋、尤中、徐文德、木芹、殷光熹、赵浩如、陈红映等文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学术成果，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云南大学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学术传统。

云南大学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继承老一辈形成的学术传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一，汉文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成绩突出，特别是古代美学和文论典籍、古代民俗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出版了《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校点》、《南华真经口义校点》、《诗经译注》、《论语译注》、《楚辞译注》、《诗经论丛》、《楚辞论丛》、《儒、道美学与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史》、《佛教文学粹编》、《汉赋与经学》、《〈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唐宋传奇品读辞典》等一批著作，其中《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点校》500多万字，2002年8月获西南地区优秀图书特等奖。

第二，云南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丰厚，尤其是在云南古代诗文和文论以及地方文化史典籍的研究方面有广泛的影响。云南省虽然地处边疆，但汉文化在云南历史上发挥着主导辐射作用，并且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典籍。除《云南丛书》外，还有地方志400多种，诗文集300多种，多达数万册。全面地整理和研究丰富的云南汉文地方文献，能为认识云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能使人们看到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影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从而为全面发掘祖国宝贵的文化宝藏、推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建设和巩固边疆作出贡献。近年来，云南大学的教师先后出版了《滇云诗词》、《古诗中的云南》、《云南历代诗词选》、《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历代诗人咏昆明》、《周钟岳诗文校注》、《赵炳龙诗文校注》、《云南地方文学史》等著作。其中《云南历代诗词选》是对云南古代诗词研究的一部总结性的古籍整理著作，出版社作为精

品图书出版;《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在中华书局出版,系统地让人们看到了云南还有如此精粹的古代诗文论著,得到了同行的好评。

第三,中国有着 5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对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不太重视的,在一些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著作中,甚至根本不提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现在,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不能缺少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已成为学界共识。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彝族彝文典籍有 1000 多部,纳西族东巴文典籍有 1500 多部,傣族傣文典籍有 1000 多部,还有大量用汉文或白文写成的白族典籍,这些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是云南省独有的文化资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还是边疆地区社会和民族文化建设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能为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能展现出云南少数民族悠久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将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西南边疆、建设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云南大学学者一直重视对云南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对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在民族古典文献的学科界定、分类、特点、整理与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先后出版了《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编目》、《楚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志校补》、《南诏野史汇证》、《滇志校点》、《藏文历史档案研究》、《傣族历史档案研究》、

《西南彝族历史档案》、《百苗图疏证》、《百苗图抄本汇编》、《贝叶文化论集》、《梅葛的文化解读》等著作，为发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出了贡献。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并推动云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我们计划出版《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第一批首先出版3部著作，即罗江文《中国古典文献学纲要》、冯良方《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李道和《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我们虽身在边疆，但仍希望能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巴蜀书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云南大学古典文献学丛书》编委会

目 录

MU LU

前 言	(1)
第一章 元以前的云南汉文学文献	(27)
第二章 明代云南汉文学文献	(90)
第三章 清代云南汉文学文献	(129)
第四章 云南古代汉文学总集、丛书	(206)
第五章 云南古代汉文学批评文献	(225)
第六章 云南古代汉文学相关文献	(243)
后 记	(306)

前 言

一、汉族移民、汉文化与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

我们所理解的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是一种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学文献。

今天的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北与西藏、四川毗邻，东与贵州、广西相连，南与缅甸、越南、老挝接壤，面积约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历史上云南的版图与今天相比，略有差别，但大体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云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就有“元谋人”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其他的一些考古发现，也清楚地证明了云南远古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的密切关系。从史籍的记载来看，至少在战国时期，如庄蹻入滇，云南与中国其他地区就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当然，由于地域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某些历史时期不如内地的一些省份那样严密。汉王朝在滇设立郡县，三国时期蜀汉平定云南，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基本上由“南中大姓”控制，唐代云南为南诏，宋代为大理国，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长期以来云南与中央王朝既有分又有合。从元

代开始，云南被全面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成为一个行省，与其他省份完全合为了一个整体。总而言之，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又是一个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地区。所以，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古代汉文学文献，既是中国文学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有自己的特色。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现在共有 25 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 30% 以上。历史上的云南少数民族种类比今天还要多。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云南文学最耀眼的光芒。然而，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汉族也是云南众多民族中的一种，而且随着汉人的大量入迁和繁衍，明代汉族人口数量已超过少数民族。也就是说，明清以来云南已是一个汉民族人口占主体的地区。与之相应，云南古代文学文献也是以汉文学文献为主体的。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勾勒一下云南汉族迁入和繁衍的历史。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楚人庄蹻率众入滇，来到滇池地区，是较早的内地人进入云南的一次迁徙，不过，移民数量有限，很快就淹没在当地的西南夷中，“变服，从其俗”了。秦“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可能有一些内地人入滇，但秦享国之日浅，来者应不多。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移民数量增加了。《史记·平准书》曰：“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乃募豪民田南夷”。不仅“负担馈粮”者“数万人”，而且有“田南夷”者，其规模应不在小。后来，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孝武时通博

兰山，度兰沧水、濬溪，置嵩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① 博南山在今云南永平县，则汉武帝时汉族移民已达滇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战乱频仍，大量蜀人进入云南，《晋书·李雄载记》云：当时蜀中战乱，“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七郡”即云南宁州七郡。唐代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也不少，《新唐书·南诏传》载，太和三年，“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据估计，唐代因战争等原因迁徙到云南的汉族人口约有十万左右。然而，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汉族移民更多的是集中在今滇池和滇东北及滇西地区。这些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梁堆”，就是汉族人的墓葬，其墓主都是当时云南地方的统治者“南中大姓”。这些人为了避战乱等原因从内地迁到云南并世代居住下来，逐渐形成强大的势力，取得显赫的地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史籍中被称为“夷汉”、“夷晋”或“戎晋”、“宋夷”等，但有别于土著的夷人。^②

元代在云南实行军屯，但当时随军移入的汉族人口还不是很多。大规模的汉族移住云南是从明代开始的，其主要的方式是军屯和民屯，此外采矿、经商也是汉族移民的重要方式。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从明代开始，云南人口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是“夷多汉少”，此后则是“汉多夷少”。清代云南汉族移民进一步增加，如广南、开化、元江、普洱等滇南、滇东南地区，明代统治尚未深入，汉族人口也很少，清代则广泛开发，“约在二

①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② 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百年的时期，汉族人口已占过半”，即使在一些山关僻险之地，由于设“绿营”屯住，逐渐形成村落，汉族人口遍布山野，尤为显著。“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亦莫不有汉人踪迹。”^①总之，明清以来，云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并确定下来了。

汉族人口的大量移住，不仅是民族结构的变化，也是文化结构的改变。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同样秉承了“耕读”传统，一方面聚族而居，从事开荒种田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则读书学文。自汉代开始，中央朝廷确立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儒家文化成为了汉文化的核心。据史籍记载，至少在东汉时期，儒学已经在云南开始传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肃宗元和中，蜀郡王阜（当作阜）为太守（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阜是一位儒生，曾赴犍为学《韩诗》。他“兴起学校”，教授的当是儒家经典。而在朱提（今云南昭通）发现的东汉《孟孝琚碑》，其碑主孟孝琚本由蜀郡严道县迁来朱提，“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这些材料都清楚地表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几乎是伴随汉族人口的迁移同步传播到云南的。

汉文化在云南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元代。元平定云南后，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一方面设立行省，另一方面兴办儒学。元初赛典赤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大力提倡儒学。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载：“是岁（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抵大理，下车莅

①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之《道光云南通志·关哨汛塘概说》。

政，……中庆、大理两路设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充其职。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元史·赛典赤传》亦云：云南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其后，昆明、安宁、路南、大理、永昌、姚安、曲靖、临安等处，皆建孔庙，兴儒学。明清两代，儒学遍布云南的府、州、县及卫所，习儒读书的风气已相当普遍，云南的儒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以澄江为例，正德《云南通志》记载：“澄江人初不知学，入国朝，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趺任而封及亲属者，于是间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导，而家有诵读之声矣。”又如，《云南丛书》之经部初编、二编合计 24 种，其中已出现了清代云南宝宁（今广南县）人方玉润《诗经原始》那样不徒俯视滇云，直欲压倒中原的著作，足以证明云南人对儒学的接受和阐释，对传统学术中的核心著作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与儒学伴生的是科举入仕。汉代经学形成之初就与为朝廷培养和选拔治理人才有关，所谓以经术取士是也。东汉时期云南已“兴起学校”，但以经术取士的情况史籍无载。晋代的情况则可以略知一二，《华阳国志·南中志》曰：“太康三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所谓“四姓子弟”就是指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四个大姓家庭出身的人，他们要步入仕途，“必先经都监”，即察举。例如建宁爨氏就是著名的南中大姓，据《爨龙颜碑》载，曾任宁州刺史的爨龙颜“举义熙十年秀才”，正是通过察举而入仕的。其他的南中“秀才”还有董敏、庞遗、爨宝子等。而“秀才”，一般

来说是要“知书”的。从其他的一些记载来看，也可以这么说，南中大姓之所以能成为云南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子弟知书，从而步入了统治阶层。

汉晋以来的察举制，还只是科举制度的前身。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建立并成熟，受其影响，大理国也有类似的制度。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随着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恢复，中央王朝在云南也开始了开科取士。但是，整个元代云南读书应举还未形成风气，终元之士，云南只出了5个进士，且都是昆明人。这种情况至明代则大为改观。冯甦《滇考·滇南科目》云：“至永乐九年，诏云南布政司取士。是岁八月，举生儒洪诚等28人，诚与杨春皆举进士，九月复试贡生，取赵诚等21人，此有明科目之始也。是后，三岁一举，或50余人，或30余人，多寡不等。”又据《万历云南通志·学校志》记载，自洪武二十七年至万历二年，云南考中进士的有162人，中举者则有千人。清代云南科举更盛，至清末，云南终于出现了一位经济特科的第一名，滇中唯一的状元——袁嘉谷。纵观云南历代科举出身之人，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其祖先是来自其他省份迁入的。

以科举入仕者，当然主要是读儒家经典，最终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不过，儒家从来就重视礼乐教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学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且“余事作诗人”，“吟咏性情”乃是古代士人分内之事，乃至生命存在的形式，文学创作也就兼而有之了。

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就是在上述汉族移居、学校兴办和读书应举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受其影响，云南古代汉文学文

献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区性。元以前，云南汉文学文献留存较少，虽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总体而言与汉族人口不多，学校教育不发达，阅读汉文典籍的风气尚未大开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明清的情况大为改观，谢肇淛《滇略·献略》云：“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士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也。”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的地区性也相当明显。今昆明、大理、保山、丽江、曲靖、红河、楚雄等地市古代出现的作家相对较多，一些县区如今晋宁、安宁、嵩明、宜良、澄江、华宁、建水、蒙自、石屏、文山、广南、禄丰、大姚、姚安、剑川、弥渡、永胜、景东、腾冲等地相对集中，这些地方都是古代汉民族的聚居地。比如建水，这里古称临安，明清以来由于采矿业的发展，成为汉族人口聚居的移民城区，有现存全国第二大的孔庙，十分重视读书应举，科举人物冠于滇南，有“文献名邦”之称。

兴办学校，读书应试，吟诗作文，主要是汉族人的生活方式。迁入云南的汉人聚族而居，庠序子弟，汉族为多。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受汉文化的影响，云南古代汉文学创作并非只是汉族作家的专利，其中也不乏出身于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的篇什。早在南诏时期，聘请内地文人为师就已成先例。南诏时期任清平官的郑回，本是相州（今河南、河北一带）人，曾任蜀西泸令，为南诏所俘，“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

笞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①南诏还派遣大量的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②。这些成百上千的贵族子弟学成归乡，对传播汉文化必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南诏同时还崇信佛教，于是出现了一个释儒兼修，梵汉并学的“释儒”或“师僧”阶层。南诏、大理国时期，不少上层统治者工诗能文。南诏君王如异牟寻、寻阁劝皆有汉诗文留存，身居布燮的杨奇肱、段义宗等人皆有辞藻。元代云南的统治者兴学向儒，不仅汉族子弟入学读书，而且也有少数民族子弟置身其间，甚至出现了姚州路总管高明那样的兴办课诵汉文典籍学校的少数民族地方官员，“近聘荆益关陕之士，以为民师；远购洙泗廉洛之书，以为民学。异时烨然，声容文物之盛，非蜀之文翁，闽之常袞欤？”^③元末明初，大理段氏和梁王及女儿阿盖等人，还留下了一段令人唏嘘不已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孔雀胆”故事诗文。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土官雅好汉文诗文，形成了三迤大地的一道特殊的文学景观。有的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化修养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著名的丽江木氏土司家族多有文人，杨升庵、徐霞客等中土名士皆成其座上客，木氏诗文集流布海内，“云南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④另外，姚安高氏、武定凤氏、宁州禄氏、大理王氏等土司家族子弟，读儒经，习汉字，吟咏诗文，且有中科第者，已是司空见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统治阶层

① 《旧唐书·南诏传》。

② 孙樵《书田将军边事》。

③ 欧阳玄《升州为路记》。

④ 《明史·土司传》。